

论苏门之立

萧庆伟,陶然

(1. 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福建 漳州 363000; 2.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苏门是北宋最为重要的文人群体之一。或云苏门之立“始于国事而不始于文事”,其实不然。从时间上说,它萌芽于熙丰而成立于元祐;从本质上来说,则苏门之立始于文学交谊而成于国事。从中可以看出它和新旧党争息息相关的一面。

[关键词] 苏轼 苏门六君子 新旧党争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2-0150-04

On the Existing of Sumen

XIAO Qing-wei¹, TAO Ran²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Zhangzhou 363000;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Sume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lars' groups in the Song Dynasty. Someone said that the existing of Sumen "started by state but not by literary affairs". In fact, it was not true. From the view point of the time, it appeared in the years of Xifeng and riped in the years of Yuanyou. Essentially, the existing of Sumen started from literature and riped from national affairs.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it had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rife of the old and new political parties.

Key words: Su Shi; the six gentlemen of Sumen; strife of the old and new political parties

北宋最为重要的文人群体有三:一是欧门文人群;二是苏门文人群;三是江西诗派。三者呈更替发展与递相演变之势。苏轼原属欧门中人,嗣后自辟一门,引无数文人尽入其门;而黄庭坚又自苏门外再添疆宇,并成就了有宋一代最为盛大的江西诗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一部北宋文学史就是由这三个文人群体形成与演变的历程构成的。欧门文人群以欧阳修为领袖,中有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曾巩和苏轼等重要成员。这一群体是在儒学复兴与庆历革新的社会思潮的孕育之下形成的。熙丰是介于欧门与苏门之间的过渡时期,其间欧门开始衰歇,其标志乃为欧阳修及其门人文士的相继辞世^①。正是在这一过渡时期,苏门渐次萌芽。由本质而言,苏门之立,始于文学而成于国事;自时间而言,则苏门之立,萌芽于熙丰而成立于元祐。

熙丰年间,苏门渐次萌芽。其表现主要为后来列于苏门的文人(本文主要是指四学士和六君子)此时已有拜谒之意与从学之求。

晁补之初谒东坡,在熙宁六年。时苏轼通判杭州,而补之适值“甫冠”之年,其《及第谢苏公书》有云:“盖补之始拜门下,年甫冠^[1]”。知补之是时年二十有一(参刘乃昌注《晁氏琴趣外篇》附录《晁补之年谱》)。而在此前一年,补之亦尝述其从学东坡之愿,观其《上苏公书》可以知此,是书云:“阁

[收稿日期] 2000-04-16

[作者简介] 1. 萧庆伟(1964-)男,江西南康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2. 陶然(1971-)男,江苏南京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① 梅尧臣卒于嘉祐五年(1060),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1072),曾巩卒于元丰六年(1083),王安石卒于元祐元年(1086)。

下之入吴也……故补之将首为吴人庆,而次为天下有望于阁下而化者庆也。某济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学术不足以自致于阁下之前,独幸阁下官于吴。而某亦侍亲从宦于吴也。故愿随吴人拜堂庑而望精光焉^{〔2〕}。补之“生二十年矣”,即熙宁五年,时补之随父亲端友寓新城官所,其欲拜东坡“堂庑”之意亦甚为明了。明年,补之即遂其愿,不惟谒过东坡,亦自是从而学;在门下二年,所闻于左右,不曾为今日名第计也^{〔3〕}。所谓“在门下二年”,当指熙宁六年、熙宁七年两年。随后,苏轼移官密州,而补之亦侍亲至京城,两人之游遂由此暂止。

秦观初欲从游东坡,在熙宁七年。秦瀛《淮海先生年谱》记:“闻眉山苏公轼为时文宗,欲往游其门,未果。会苏公自杭倅徙知密州,道经维扬,先生预作公笔语,题于一寺中。公见之大惊,及晤孙莘老(觉),出先生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必此郎也。遂结神交’。又《冷斋夜话》卷一亦云:‘东坡初未识秦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作坡笔语题壁于一山寺中,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寺壁者,岂即此郎耶?’”熙宁七年九月,苏轼被命权知密州,十月途经扬州,秦观题语寺中,当在此时。然直待元丰元年,少游才晤及坡公。是年四月,秦观入京应举,途中见东坡于徐州。时轼有次韵之作,题为《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据此诗题,知秦观乃“入京应举”途中始谒东坡,而诗中“故人坐上见君文,谓是古人吁莫测”两句,亦可与《冷斋夜话》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诸语相互印证。是时,秦观虽是初谒东坡,然二人已有师弟子礼,陈师道《秦少游字叙》云:“熙宁、元丰之间,眉山苏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间见如客。扬秦子过焉,置醴备乐,如师弟子^{〔4〕}。”

黄庭坚与苏轼之交游亦始于元丰元年。是年,庭坚在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任作《古风二首上苏子瞻》,其二有云:“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以“小草”自喻,抒其欲“相依”东坡之志。苏轼旋为次韵,题作《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此为苏黄酬唱之始^①。然苏、黄之游但止于神交而已,当时两人并未能谋面,观苏轼是年《答黄鲁直书》可知。书云:“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庭坚初拜苏轼,当在元祐初苏轼居朝之日,庭坚白云:“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5〕}。”

熙宁三年,张耒从苏辙游学于陈州^②。明年六月,苏轼出为杭州通判,途中与子由晤于陈。时耒仍居陈,当谒过苏轼。张耒《与鲁直书》云:“耒年十八九时,居陈学”。张耒十八九岁时,正为熙宁四年、熙宁五年之际,故笔者认为张耒此间当已见过苏轼。

苏轼谪居黄州间,李廌谒苏轼于黄州,贻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再拜受教^{〔6〕}。

相比之下,当日陈师道与苏轼的交游显得很一般。苏轼守徐,师道公“以民事太守(苏轼)”而已,前引师道“置醴备乐”以待少游诸语,正说明他与苏轼当日并未达成“师弟子”之谊。

或谓“苏门之立却始于国事而不始于文事”^③,其实不然。缘由如次:首先,由前之考述可知,“六君子”初识东坡,或止于初谒,或止于初从东坡而学,大多以文学为因缘,其中并不存有任何的政治动机。秦观预作坡公笔语于扬州山寺,即在于其“闻眉山苏公轼为时文宗”。前引坡诗“故人坐上见君文,谓是古人吁莫测”,亦可证苏、秦之交乃因“文学”而致,元丰末,苏轼尝以其诗荐之于王安石^{〔7〕};张耒“从苏辙学,辙见其文爱之”。又“苏轼亦深知之(指张耒)称其文为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8〕}”。晁补之“谒见苏公,出《七述》,公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苏公以文章名一时,士争归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誉公如不及,至屈辈行与公交。由此,公名籍甚于士大夫间^{〔9〕}”。元丰

① 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云:“黄庭坚字鲁直,时为国子监教授,以二诗寄先生,先生始与之有酬唱。”

② 《宋史》卷四四四《张耒传》云:“耒十七岁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苏辙爱之。”

③ 有关论述可参见薛瑞生《苏门、苏学与苏体》一文,《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

元年,黄庭坚《上苏子瞻书》云:“伏惟阁下(指苏轼)学问文章,度越前辈”。知鲁直推崇子瞻,尚有“学问文章”一端。而子瞻称誉鲁直亦缘其诗文。《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载:熙宁初,“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元丰中,李廌拜谒东坡,亦以文为贽,并由此“受知于苏轼”^[10]。陈师道虽晚入坡门,元祐初苏轼荐其入朝,亦以“文词高古,度越流辈”为说^[11]。所以说,六君子之入苏门,虽早晚有别,然以文学辞章为媒,则其同者,与国事并无关涉。其次,六君子辈行、入仕皆较晚,故多未预熙丰新法之争。秦观元丰八年登进士第,时年三十有七;晁补之元丰二年中进士第,张耒熙宁六年中进士第,黄庭坚治平四年登进士第,李廌元祐初应试而未第,因以布衣终身;陈师道不愿以场屋进取,故亦止于教授而已。其中,黄庭坚举进士最早,入仕亦早。六君子中,惟黄庭坚一人以在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等)而历神宗在位之世。是故,黄庭坚熙丰间尚有慨叹新法病民之作,如元丰五年作《上大蒙笼》诗,中有云:“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但愿官清不爱钱,长养儿孙听驱使”。写新法以来盐禁与青苗钱息诸事。所论亦与东坡《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诗相同。然而,这一相同之处并不是黄庭坚立于苏门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吸引他的是苏轼的“学问文章”。此外,黄庭坚推崇苏轼还在于苏轼“立朝以直言见排根,补郡辄上最课”的“内外称职”的政治品行^[12],而这种政治品行与两人具体的政治见解并无关联。因此,也不能说黄庭坚乃以政见相同而入坡门,至多只能说黄庭坚服膺苏轼的政治品行而“愿亲炙先烈以增益其所不能”而已^[13]。又如陈师道:“熙宁中,王氏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14]。陈师道不满王安石,以此为最。苏轼虽亦不满王氏经学,然止于“好使人同己”一端^[15],故师道、东坡两人见解也不尽相同。其余如秦、晁、张之属,入仕虽晚,但并不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只是他们实难于通过政见相同的渠道而汇入苏轼一门。后来他们被视为元祐旧党,多与其出于苏门有关。在当时两党论争愈演愈烈的政治氛围中,六君子由初始文学交游而导向政见相同一路,亦为情理中事,这也是应予以注意的一面。

通过以上讨论,笔者认为,六君子之服膺东坡,在于东坡为当日“文宗”而已。六君子递相以文为贽,正基于东坡之“为时文宗”。惟其如此,苏门之立,非始于国事,而始于文事。《郡斋读书志》卷一九云:“先是(指元祐前)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皆以文学游苏氏之门,至是(指元祐中)同入馆,世号四学士”。

苏门诗人群是在元祐更化与旧党回归朝廷的政治背景下渐次形成的。换言之,苏轼元祐初还朝,是苏门诗人群从熙丰萌芽到元祐成熟的重要契机。若无元祐更化之治和苏轼之重还朝中,即不可化成“四学士”或“六君子”之实,遑论其交游之甚欢与诗艺之切磋。六君子(李廌试贡举落第,以布衣终身,故可以不论)元祐间或入学官,或居馆职,皆与当时旧党之回归朝廷至相关联。惟其如此,元祐遂有“文物全盛”之称。汪藻《呻吟集序》云:“元祐初,异人辈出,盖本朝文物全盛之时也”^[16]。又其《柯山张文潜集书后》云:“元祐中,两苏公以文倡天下,从之游者,公(张耒)与黄鲁直、秦少游、晁补之号四学士”^[16]。秦瀛《淮海先生年谱》元祐八年八月条载:“是时,先生(秦观)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并列史馆,时人称苏门四学士”。皆可明此。

四君子或六君子因苏轼而卷入政治纷争(李廌未及第,故未卷入),始于元祐年间。元祐三年十月苏轼《乞郡札子》谓:“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度”。苏轼自元祐元年九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至此上《乞郡札子》,正为两年。其时,洛蜀党争因苏轼策题而起,所谓“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盖指此。苏门弟子即由此而卷入其中。元祐二年,秦观作《朋党》上下篇,为苏轼辩诬。以至于秦观次年制科应试未售,即因洛党中人“诬以过恶”^[17]。而此前苏轼举以自代的黄庭坚,也被“诬以过恶”^[17]。此后,黄、秦二人不断遭到洛党中人的弹击。元祐三年五月,“诏:新除著作郎黄庭坚依旧著作佐郎,以御史赵挺之论其质性奸回,操行邪秽,罪恶尤大,故有是命”^[18]。元祐五年五月,“右谏议大夫朱光庭

言新除太学博士秦观,素号薄徒,恶行非一,岂可以为人之师,伏望特罢新命。诏:观别与差遣^{〔19〕}。元祐六年,“诏秦观罢正字,依旧校对黄本书籍,以御史贾易言观过失,及观自请也^{〔20〕}。黄、秦之外,陈师道亦遭论列:“言者谓在官尝越境出南京见轼,改教授颍州。又论其进非科第,罢归^{〔21〕}。”

晁补之、张耒元祐间虽未受到弹击,但由于他们与苏轼的密切交往,故绍圣以来也不免迁谪。晁补之“以儉邪之资,力附奸恶之党,表里倡和,阿附道谏,特见称于凶人,遂窃处以清贯^{〔22〕}”,因贬监处州盐酒税务。张耒“自昔害熙丰之政事,至今称轼、辙之奸雄,尔赖以进身,利其为地,因狐趋谄附,肆乌合以胁从。^{〔23〕}山谷、少游亦然。山谷“擢于诸生,使预著作,罔念朝廷之属任,专怀朋党之私恩^{〔24〕}”。所谓“专怀朋党之私恩”,即指其依附苏门之事。秦观“浮薄小人,影附于(苏)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25〕}”。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

由上可知,苏门涉于国事,乃元祐以来之事,其初仅涉及文学而已。本文之考辨,对于重新认识北宋这一重要文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或许不无裨益。

[参 考 文 献]

- [1] 晁补之. 鸡肋集(卷五二) [Z].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5.
- [2] 晁补之. 鸡肋集(卷五一) [Z].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5.
- [3] 晁补之. 鸡肋集·及第谢苏公书(卷五二) [Z].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5.
- [4] 陈师道. 后山居士文集(卷一六) [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4.
- [5] 黄庭坚. 豫章黄先生文集·跋子瞻木山诗(卷二六) [Z].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5.
- [6] 脱脱. 宋史·李廌传(卷四四四)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116.
- [7] 王偁. 东都事略·秦观传(卷一一六) [M]. 北京: 中华书局, 影印文澜四库全书本.
- [8] 王偁. 东都事略·张耒传(卷一一六) [M]. 北京: 中华书局, 影印文澜四库全书本.
- [9] 张耒. 张耒集·晁无咎墓志铭(卷六一)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900, 901.
- [10] 王偁. 东都事略·秦观传·附(卷一一六) [M]. 北京: 中华书局, 影印文澜四库全书本.
- [11] 苏轼. 苏轼文集·荐布衣陈师道状(卷二七)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795.
- [12] 黄庭坚. 豫章黄先生文集·上苏子瞻书(卷一九) [Z].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5.
- [14] 脱脱. 宋史·本传(卷四四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115.
- [15] 苏轼. 苏轼文集·答张文潜县丞书(卷四九)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427.
- [16] 汪藻. 浮溪集(卷一七) [Z].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17] 苏轼. 苏轼文集·乞郡札子·贴黄(卷二九)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829.
- [18]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三年五月丁巳条(卷四一一)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3899.
- [19]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五年五月庚寅条(卷四四二)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4518.
- [20]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六年八月癸巳条(卷四六四)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4339.
- [21] 脱脱. 宋史·本传(卷四四四)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115.
- [22] 未知撰人. 宋大诏令集·晁补之落校理监当制(卷二〇八)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784.
- [23] 未知撰人. 宋大诏令集·张耒散官黄州安置制(卷二一二)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803.
- [24] 未知撰人. 宋大诏令集·黄庭坚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制(卷二〇七)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777.
- [25]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绍圣元年闰四月乙酉条(卷一〇) [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6, 134.